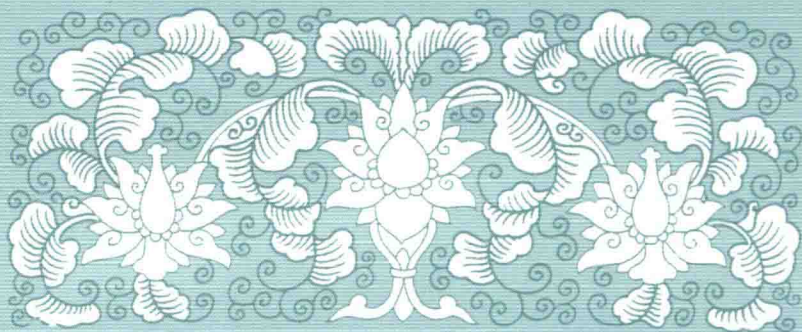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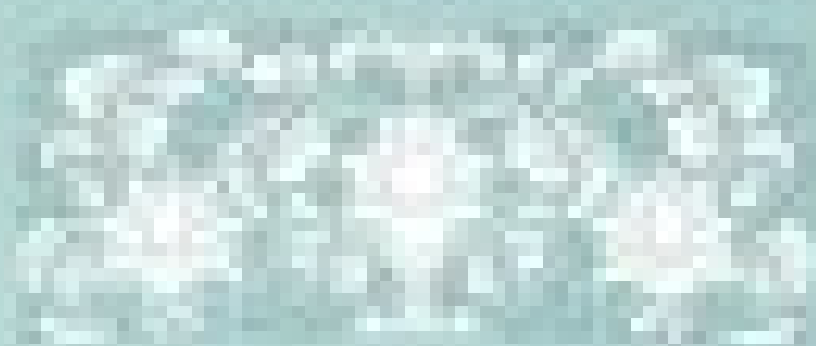


多语环境下的 母语建构与母语社区规划研究

方小兵 著

非外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植物根系与土壤肥力研究

张明华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多语环境下的 母语建构与母语社区规划研究

方小兵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语环境下的母语建构与母语社区规划研究 / 方小兵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5203 - 1363 - 6

I. ①多… II. ①方… III. ①母语 - 研究 IV. ①H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48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沈丁晨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55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 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规划观及其中国实践研究”
(项目编号 16YJA740009) 资助。

序

什么是“母语”？学界内外目前对此没有统一的认识。“母语”是“最先学会的语言”吗？是“最贴切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的语言”吗？是“感觉最亲切的语言”吗？是地域认同或民族认同的语言吗？或者都是，或者都不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本书中找到有关答案。从学术角度看，本书是目前关于“母语”概念的最详尽的讨论；书中也提供了许多详尽生动的语言习得、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的研究案例。

无论是从语言学理论还是从语言规划研究的视角，“母语”课题都是一个高难度的前沿课题。关于“母语”，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述中已经提出了一些彼此矛盾的观点，缺乏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也对语言规划的实践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方小兵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选择以“母语”为研究课题，首先是从学科本身的需要出发。目前，关于“母语”概念的片面的、模糊的理解以及混乱的使用已经开始限制和影响语言学的发展，本书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填补了有关基础研究的空白。与此同时，方小兵也选择了语言规划的视角并且紧密结合了我国的实际。从这一点看，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的选择也体现了研究者的“家国情怀”。

本书不仅提供了母语研究的详尽的文献综述，讨论了已有的典型个案，还报告了作者自己设计的实验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在此基础上，作者应用社会建构理论、语言习得理论、言语社区理论等对“母语建构”“母语能力”“母语权利”“方言母语”“双母语”等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什么是母语？方小兵在此给出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充实的答案。他的答案兼有语言学的学科视野和跨学科的思考 and 领悟；既有对前人成果的继承，也有自己的综合和创新；既有理论的建设，也有贴切的例证。难能可贵的是，在国内现有的图书信息条件下，本书作者跟踪了国内外学者的最

新研究成果。以此而论，本书的理论创新已经领先国际，充分显示了新时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水平。从本书中我们看不到“独树一帜”的国别语言学的影子，看到的是我国青年学者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攻克难题、领先国际的踏实学术成果。

作为方小兵曾经的论文导师、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我在此对他这本专著出版和取得的其他成果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也期望他再接再厉，取得更多的成果！

徐大明

2017年5月24日

于澳门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4)
一 国外研究	(4)
二 国内研究	(8)
第三节 研究内容	(15)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17)
一 研究意义	(17)
二 研究方法	(19)
第五节 本书的研究框架	(24)
第二章 母语研究的关键问题	(26)
第一节 母语意识与“母语”词源	(26)
一 语言意识与母语意识	(27)
二 “母语”术语来源考证	(32)
第二节 母语界定标准的多重阐释	(37)
一 语言习得：第一语言	(38)
二 民族归属：本族语言	(39)
三 语言能力：主导语言	(40)
四 语言态度：认同语言	(41)
五 其他标准	(42)
第三节 母语研究若干争议问题	(44)
一 方言母语：“母言”与“母语”的纷争	(45)
二 群体母语：社会母语、国家母语与广义母语	(47)
三 母语失却和母语磨蚀	(50)

第四节 “母语”概念的重新界定	(55)
一 传统母语界定中存在的问题	(55)
二 新的母语界定标准	(66)
本章小结	(68)
第三章 母语的建构性	(70)
第一节 建构性：母语的本质特征	(70)
一 母语的原生论与建构论	(70)
二 母语建构：言语社区理论视角	(75)
第二节 母语能力建构与母语认同建构	(80)
一 语言早期习得与母语能力建构	(80)
二 母语认同的建构与母语身份	(86)
第三节 母语建构实证研究	(91)
一 云南双语状况问卷调查	(92)
二 幼儿语码转换行为观察	(100)
第四节 群体与个体的母语建构：案例研究	(107)
一 群体母语建构案例分析	(108)
二 个体母语建构案例分析	(114)
本章小结	(116)
第四章 母语的二重性	(118)
第一节 母语的二重性	(118)
一 母语二重性的具体体现	(118)
二 母语：“语言事实”还是“语言学事实”？	(120)
第二节 母语的主客观二重性	(125)
一 “他者认同”的价值	(126)
二 个案研究：英语是新加坡的母语吗？	(130)
第三节 母语：个体与群体二重性	(133)
一 社会母语	(133)
二 方言母语	(137)
三 个案研究：新加坡“讲华语运动”与方言母语的 消失	(140)
第四节 从二重性看母语界定新标准	(145)
一 母语界定新标准的理论优势	(145)

二 原型视角的“母语”概念体系	(147)
本章小结	(148)
第五章 母语的共生性：双母语研究	(150)
第一节 双母语概念的提出	(150)
一 双母语的相关研究	(150)
二 双母语的界定	(157)
第二节 同步习得与双重认同	(161)
一 同步习得	(161)
二 双重认同	(163)
第三节 母语双重建构的实证研究	(168)
一 同步习得：斯瓦迪士核心词习得测试	(169)
二 双重认同：配对语装实验	(172)
第四节 双母语概念：相关争议与研究价值	(178)
一 概念争议：“早期双语”与“半母语”	(178)
二 双母语概念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183)
本章小结	(187)
第六章 母语的流变性与母语社区规划	(188)
第一节 母语的流变性：解构与重构	(188)
一 个体母语的磨蚀与消解	(189)
二 群体母语转用	(193)
第二节 母语社区规划：从语言规划到言语社区规划	(196)
一 以母语为对象的语言规划	(196)
二 言语社区规划与母语社区规划	(199)
三 母语社区规划的五要素	(201)
四 母语社区规划理论框架的阐释优势	(206)
第三节 母语安全	(210)
一 母语安全问题的具体表征	(210)
二 母语安全新思维	(215)
三 母语安全应对方略：以汉语为例	(218)
第四节 母语经济	(220)
一 语言资源意识：母语经济理念的由来	(221)
二 双母语：母语经济中的珍贵资源	(223)

三 语言服务：母语经济的发展路径	(225)
本章小结	(227)
第七章 结语	(229)
附录一 云南双语状况调查问卷	(233)
附录二 访谈提纲、访谈名录与文字材料	(240)
附录三 配对语装实验调查表及看图说话材料	(287)
附录四 斯瓦迪士 100 核心词习得调查表	(295)
附录五 国外网络论坛母语视点选译	(296)
参考文献	(303)
后记	(32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在各类语言学类著作中，“母语”是一个高频词，有许多相关的术语和概念，如“（非）母语者”“母语能力”“母语习得”“母语迁移”“母语磨蚀”“母语维持”“母语优势”“母语社区”“母语认同”“母语资源”“母语濒危”“母语权利”“国际母语日”，等等。即使在其他学科（如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文献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诸如“母语文化”“母语文学”“母语教育”“母语教材”“亲近母语”“母语思维”“母语污染”“母语危机”“母语传承”“民族母语”“母语保护”“母语安全”之类的表述。

乍看上去，母语概念似乎明白无误、毋庸置疑。目前关于母语的研究也几乎不涉及母语概念本身，而是把母语看作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研究内容主要是关于母语的应用性研究，很少有探讨母语的性质、特征、功能、地位的专门性研究，更缺乏系统的母语理论的整体建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母语”一词使用的广泛性和随意性，它甚至已经变得不太像一个专门的术语了。一些语言学词典（如《牛津语言学词典》、《现代语言学词典》）不再将“母语”作为单列的条目。有的词典即使单列，也采用参见“本族语”或“第一语言”的导引形式。

然而，母语并非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清晰明确的概念。实际上，它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比如：为什么是“母语”而不是“母语”？聋哑儿童有没有母语？（或者：手语是聋哑人的母语吗？）是否存在没有母语的民族（如 200 年前的犹太人，以及当今中国的回族人，他们的民族母语是

什么)? 普通话是中国人的母语吗? 有没有双母语的人(如族际婚姻家庭儿童)? 母语习得有无截止期(或曰“临界期”)? 如何确定母语能力评测标准——是易懂度、流利度,或是句法敏感性? 在非白人国家(如新加坡、印度等),英语是否具有(个人或群体)母语地位? 如何解决母语权利中的“伦理学悖论”(政府鼓励学习,家庭却自愿放弃)?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传统的母语概念主要是以单语社区的单语人为研究对象的,母语既是“家庭中最先习得的语言”,也是“所属民族的语言”“使用能力最强的语言”“具有身份和归属感的语言”“使用最广泛的语言”,等等。在单语环境下,这些属性基本上是重合的。然而在多语环境下,母语的界定与识别就遇到了问题。斯古纳伯-康格斯(Skutnabb-Kangas, 1981)指出,对于双语和多语人,上述每一个标准可能都会给讲话人赋予一种母语,很难说哪一种是母语。

尽管大多数语言学工具书在定义母语时都有“一个人从小(自幼)……”之类的表述,学者也都基本认可这一说法,但是在实际调查研究中,并不真正遵守这一界定。比如,《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3)》收录了《北方较小民族母语衰变与语言保护》一文,作者丁石庆(2013)将鄂伦春族“母语习得的时间”分为三个类型:“从小就会”“上学后”“工作后”,比例分别为70.9%、8.1%和21.0%。也就是说,许多鄂伦春人是在工作以后才“习得”本民族语的,这样的“母语”概念似乎与工具书中的“从小(自幼)”不相吻合。同样,有学者提出将标准语称为“社会母语”(如王宁、孙炜,2005)或“国家母语”(如王珏,2009),这种群体性定义似乎忘记了工具书定义中“一个人……”的个体性界定。在这里,是工具书的定义不够完善,还是学者的观点存在疏漏? 事实上,研究者们对“母语”的理解一直存在重大分歧,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术语的争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移民规模迅速扩大,族际婚姻家庭急剧增多,语言接触面扩展和接触程度加深,儿童同时习得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情形比比皆是,那种基于传统的单一民族家庭、单语言社区的母语概念已经不能完全解释新的语言事实了。由母语界定和识别而引发的争论在当今世界许多地区上演着,母语概念的现实困境正是母语理论研究困乏的真实写照。

母语困境在新加坡尤为凸显。在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被认定为“母语”,分别代表新加坡的三个主要族群,而英语是主要的工作媒介语,不是“母语”。然而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英语已经成为新一代新加坡人的母语了,因为这些新加坡人从小习得英语,更愿意认同英语作为他们的母语。有人甚至指出,将英语作为母语有利于建立一个“新加坡核心”,有助于“新加坡英语”在国际上得到认同。这一观点在新加坡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的附和之,有的鞭挞之,但仍未见到为大众所能接受的结论。

从马来西亚教育部长在1986年11月27日的发言也可以看出母语困境的端倪:“所有马来西亚人,不论属于任何种族,都必须把大马国语视为他们的母语。……他们必须能够接受和以更广阔的涵义来重新为母语一词定义,而不再指华语、淡米尔语或甚至马来话是他们的母语,这是说如果他们以被认为或被视为马来西亚人而自豪的话。这必须是今天所有马来西亚人都持有的一般态度,他们不应该继续坚持对母语一词的狭隘的认识,因为这样只能导致马来西亚人之间继续出现极化”(转引自柯嘉逊,2001:273)。

在中国,对母语的理解也远未达成共识。虽然中国从2006年起就在各地举行一年一度的“国际母语日”纪念活动,但各地“母语日”的宣传内容却很不一样:一些地方在当地语委的指导下推广普通话,将普通话视作中华民族的母语;有的地区大力宣传保护当地方言,因为方言是一个人最先学会的语言,是“实实在在”的母语;有的则宣传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因为在各类文献中,“母语”和“民族”总是紧密联系的,而且少数民族的母语保护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国际母语日”的初衷;还有的大力提倡“国学”,举办者认为母语的真正内涵是祖先语言的传承,母语的精华在国学经典中。由此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我们的母语到底是什么?”的疑惑。母语概念本身的混乱必然会影响现实生活中母语权利等保障措施的实施。

母语概念的争议不但是语言研究的障碍,而且常常令政府的语言规划无所适从,进退失据,出台的语言政策缺乏可操作性,最终流于形式。所谓母语平等、母语权利、母语教育、母语安全等这些价值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其具体的社会内容的。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许多国家政府一直强调母语教育的重要性,然而究竟什么是一个人的母语,似乎并未引

起人们注意。事实情况是,双语(多语)的家庭和社区成长起来的儿童究竟选择哪一种语言作为其母语来进行教育,以及谁有权选择,一直存在争议。关于“方言母语”的性质、地位的争论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2009年7月25日在我国广州发生的“撑粤语”事件就是真实写照。^①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语言接触日渐频繁,双语双言人日渐普遍的当下,对母语问题进行讨论既有理论建设上的必要性,又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然而国内迄今为止也未出版过母语理论研究方面的专著。多年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很少见到母语理论研究方面的课题。基础理论研究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母语的应用性研究质量。时代转型呼唤母语研究的理论创新,创新的理论也将更好地反映真实的语言生活,指导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实践。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

在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母语意识兴盛的进程中,一批学者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首推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和莱奥·魏斯格贝尔(Johann Leo Weisgerber)。

德国语言学家、语文学家洪堡特认为,“我们的母语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世界”,因为语言为一个民族划定了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范围和意义的边界,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负载着一个民族特点的印记,表达了它的民族精神,“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2002: 17)。洪堡特的语言思想博大精深,以至于寻求普遍语言能力的乔姆斯基声称自己的认识来源于洪堡特,而母语精神论者(如语言相对论者)也纷纷从洪堡特的语言思想中获取动力(姚小平, 2011: 400)。

^① 2009年7月5日,为提升广州亚运会软环境水平,广州市政协提交《关于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应增加普通话节目播出时段的建议》,引起“粤语存废”之争,进而出现“捍卫粤语”的一些活动,最终酝酿成逾2000名广州民众集会抗议。参见《2010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等文献。

德国“新洪堡特主义者”魏斯格贝尔认为母语可以塑造一个民族的“世界图像”，提出要通过学校的母语教育，唤醒和增强对母语的自豪感和忠诚感。从1929年发表第一部专著《母语和精神构成》起，直到他在1984年为《哲学历史词典》撰写词条“母语”，魏斯格贝尔的母语研究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在其出版物标题中，母语这个词至少出现40次（转引自彭彧，2010）。魏斯格贝尔将母语的功能归纳为“塑造精神”、“创造文化”和“承载历史”，认为正是通过母语才“形成个人”，而且人们在母语的世界图景外别无选择，“不是我们驾驭母语，而是母语控制我们”。魏斯格贝尔认为母语对集体的影响是在“语言社团”（Sprachgemeinschaft）和“民族”（Volk）两个层面展开的。语言社团更着重于内部的凝聚力，同母语的相互关系也更密切，而民族这个概念，即使不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更多地也是在同外族发生接触的场所被提及（彭彧，2010：33—41）。

与洪堡特类似，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也认为，人的思维完全受母语的影响，人类通过自己语言中的范畴和区别特征来认识世界。这个真实的世界建立在一个群体的语言习惯的基础之上（Sapir, 1921）。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也常涉及“母语”的概念，不过书中并未展开讨论。《教程》中的“母语”有两种意义，既指历史语言学中描写语言谱系用的“母语”，也指社会语言学等学科中个人自然习得的“母语”。在中文版（高名凯译，1980）中，两种意义都统一译为“母语”。如：

“绪论·第二章”：语言学的任务是（a）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那就是，整理各语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1980：26）

“第一编·第二章”：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一个人学会自己的母语需要花多大力气，从而判定全面的变化是不可能的。（1980：109）

美国描写语言学主要代表人物莱纳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认为母语是外在的，必须通过重复模仿才能习得。他首次将“母语

人”(native speaker)这一术语引入现代语言学,其研究成果为行为主义的母语习得理论,以及基于语言特征对比的母语迁移理论奠定了基础。布龙菲尔德《语言论》中的“言语社团”“方言地理学”等章节都涉及母语问题的讨论,布龙菲尔德还为“双语”下了如下定义:“如果学外语学得跟本地人一样,同时又没忘掉母语,这就是产生了双语现象(bilingualism),即同时掌握两种语言,熟练程度和本地人不相上下。”(1984:43)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65)从“儿童如何习得母语”这一语言学难题出发,建构了包括“语言天赋论”“语言获得机制”“普遍语法”等概念在内的转换生成语法体系。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一种内在的生理遗传特征(genetic property),语言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与生俱来的,儿童不需要有意识地学母语,最终也会获得语言能力。在研究方法上乔姆斯基倡导采用内省语料,以母语语感作为判断标准,排斥以社会语言学的实证方法。在研究对象上,将“理想的讲话人/听话人”头脑中的句子作为分析的单位。乔姆斯基的心智主义母语观对当代语言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礼德(M. A. K. Halliday, 2003)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反对乔姆斯基的“天赋论”,坚持认为母语是建构起来的,声称研究母语“必须采取一种互动的、功能的和以意义为本的或为符号的观点”。他反对乔姆斯基的“刺激贫乏说”,强调儿童并不是在有限、残缺、不足的语料输入基础上构建其语法的,认为“前母语(pre-mother tongue)交谈中不存在句法结构。因此,如果说语言发展是和句法习得画等号的话,那么,在前母语阶段所发生的一切就必须忽略不计”;提出“儿语”(child tongue)和“母语”(mother tongue)是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母语是孩子所认识到的第一个全面分层次的系统:这个系统具有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语音层”。《韩礼德语言学文集》(2006)的第四卷名为《婴幼儿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Early Childhood*),收录了韩礼德关于儿童早期语言发展的研究,共16篇,包括《论儿语到母语的过渡》(*On The Transition from Child Tongue to Mother Tongue*)、《儿童语言发展的三个方面:掌握语言工具、通过语言学习、了解语言知识》(*Three Aspects of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Learning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Language, Learning about Language*),等等。在该书中,韩礼德通过用纸笔记录儿童话语的方法,详尽研究了自己儿子